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徽商与明清文学

朱万曙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徽商与明清文学

朱万曙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徽商与明清文学/朱万曙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ISBN 978-7-02-010235-8

I. ①徽… II. ①朱… III. ①徽商—关系—古典文学—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①I206.2②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2710 号

责任编辑 葛云波

装帧设计 肖辉 赵迪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80 千字

开 本 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印 张 32.25 插页 3

版 次 2014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235-8

定 价 9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出版说明

为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自2010年始，设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每年评审一次。入选成果经过了同行专家严格评审，代表当前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水平，体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创造力，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4年3月

目 录

绪论:明清商人阶层的扩增与文学生态的变化	1
上编:徽商与明清文学生态	19
第一章 徽商的崛起和“贾而好儒”的文化性格	21
第二章 徽商与明清文人的交往	50
第三章 徽商与明清文学传播	77
第四章 徽商家族与文学传统	101
第五章 徽商与明清戏曲	127
第六章 明清文学中徽商题材的创作	151
下编:明清徽商的文学创作	209
第一章 徽商文学创作的蔚起	211
第二章 徽商文学创作的特点及其价值	236
第三章 明代徽商文学创作个案	253
第四章 清代徽商文学创作个案	332
结语:经济史·文化史·文学史	421
附录一 近代徽商自传小说《我之小史》	429
附录二 明清文学中的徽州图景	447
征引书目	473
后 记	480
书名索引	483
人名索引	494

Contents

Introduction: The Expansion of the Merchant Class and the Changes of Literary Environment	1
Part One: Huizhou Merchants and Ming – Qing literary Environment	19
Chapter One: The Rise of Huizhou Merchants and Their Cultural Penchant for Confucianism	21
Chapter Two: Huizhou Merchants' Contacts with Ming – Qing Literati	50
Chapter Three: Huizhou Merchants and the Spread of Ming – Qing Literature	77
Chapter Four: Families of Huizhou Merchants and Literary Traditions	101
Chapter Five: Huizhou Merchants and Ming – Qing Drama	127
Chapter Six: Writings about Huizhou Merchants in Ming – Qing Literature	151
Part Two: Literary Writings of Ming – Qing Huizhou Merchants	209
Chapter One: The Rise of Huizhou Merchants' Literary Writings	211
Chapter Two: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 of Huizhou Merchants' Literary Writings	236
Chapter Three: Case Studies of the Ming Huizhou Merchants	253
Chapter Four: Case Studies of the Qing Huizhou Merchants	332
Conclusion: Economic History Cultural History Literary History	421
Appendix 1: <i>My Trivial History</i> , a Novel Produced by the Huizhou Merchant Zhan Mingduo	429

Appendix 2: The View of Huizhou in Ming – Qing Literature	447
Bibliography	473
Postscript	480
Title Index	483
Name Index	494

绪论:明清商人阶层的扩增 与文学生态的变化

与前代文学相比,明清文学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在精神上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其中,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当是重要原因之一。而在诸多社会经济因素中,商人阶层的扩增又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商人作为文学形象在明清文学中的呈现有比较多的论述,例如邵毅平的《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商人题材及商人形象的塑造就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梳理和分析^①;陈书禄等学者从士、商关系的转变或者从“士商契合”的视角探讨了明清文学的转型问题^②。但对于商人阶层扩增与明清文学发展变化之间的关系的考察,特别是从明清文学的生态系统变化的角度来探讨的还不多见。有鉴于此,本书将侧重以徽商为例,对此予以探讨,期望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明清文学发展的外部规律,从而更清楚地认识明清文学史发展的脉络和历史面貌。

明清两代,徽商或徽州商帮是活跃于江南乃至全国各地的商人群体,作为明清商人阶层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活跃于商场,也活跃于文坛。从历史学

① 邵毅平《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② 较早关注商人与文学发展关系的当是陈建华《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七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学林出版社1992年)一书,其第一编第三章《元末江浙文学的社会背景》中论述了“士商关系的历史性转折”问题,第五编第一章《晚明江浙文学与人性解放思潮》中论述了“晚明江浙地区士商关系及其观念形态”问题。陈书禄的《儒商及文化与文学》(中华书局2007年)以及相关论文进一步关注到商人与文学史发展之间关系,如《王阳明的儒商伦理及重商思想与明代中后期的雅俗文学》、《士商契合中转向俚俗与性灵》等文,即就此问题展开了论述。

的视角展开的徽商研究已经积累丰厚,上个世纪 50 年代,著名经济史家傅衣凌就撰写有《明代徽州商人》^①,与此同时或略早,日本学者藤井宏也发表了《新安商人的研究》^②;上个世纪 90 年代,张海鹏、王廷元主编的《徽商研究》^③一书不仅更为系统地阐述了徽商的形成、发展和衰落的过程以及资本积累、经营活动、与两淮盐业的关系、资本出路等问题,而且关注到徽商与文化的问题,专列《徽商与徽州文化》一章予以论述^④。但就徽商与文学的关系而言,目前的史学界还缺少有深度的探讨,故本书亦期望对日益引人注目的徽学研究有所裨益。

一、明清时期商人阶层的扩增

作为社会职业的商人,早在先秦就已经出现。《尚书·酒诰》记载殷人“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载的弦高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商人。司马迁作《史记》,专列《货殖列传》,为汉代及其以前的商人留下了难得的一笔记录,在他的史笔下,“既雪会稽之耻”的范蠡变名易姓做了商人;孔子的弟子子赣、子贡经商也都取得了成功;周人白圭“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成为天下“治生”之祖;猗顿靠盐起家,郭纵以铁冶成业,他们的财富能够与王者相比;巴蜀寡妇清靠着祖上的丹穴,“用财自卫,不见侵犯”。《汉书》亦列《货殖列传》,撰写了范蠡等 13 位商人的传记。此后,受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正史不再为商人列传。但是,商人作为一个社会不可或缺的角色仍然活跃于各个时代。

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在其《白银资本》一书中指出,从 16 到 19 世纪,

① 傅衣凌《明代徽州商人》,系作者《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的一部分(人民出版社 1956 年),后被收入《徽商研究论文集》,《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② [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原载于日本《东洋学报》第三十六卷第一、二、三、四号,时间为 1953 年 6 月、9 月、12 月及 1954 年 3 月。后由傅衣凌、黄焕宗翻译,分载于 1958 年《安徽历史学报》和 1959 年《安徽史学通讯》,并收入《徽商研究论文集》。

③ 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④ [日]重田德《清代徽州商人之一面》,分析了徽商“弃儒就贾”的问题。见刘森辑译《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黄山书社 1988 年。

“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①。弗兰克通过大量的事例对同时期的东西方进行比较,对“西方中心论”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16至19世纪,“中国中心”地位的确立,显然是由中国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促成中国经济地位提升的原因当然有多种,生产力的发达,人口的增长,城市经济的活跃,都是其原因。但商人数量的增加、经商风气的蔚起、商品流通的活跃,无疑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记载明代正德前后经商风气的变化:“余谓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盖因四民各有定业。……百姓安于农田,无有他志。今去农而改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②而在嘉靖、万历年担任朝廷重臣的张瀚,在其《松窗梦语》卷四,还专门撰写了《商贾纪》一节,记载和描述了东西南北各地商贾活跃的情形和地域特点,如:“大江以南,荆楚当其上游,鱼粟之利遍于天下,而谷土泥涂甚于《禹贡》。其地跨有江、汉,武昌为都会。郢、襄上通秦、梁、德、黄,下临吴越,襟顾巴蜀,屏捍云贵、郴、桂,通五岭,入八闽。其民寡于积聚,多行贾四方;四方之贾,亦云集矣!”^③何氏、张氏的记载,说明在正德以后,进入商人队伍的百姓越来越多,经商已成为农、工之外的又一重要社会分工,商人阶层较之以前成倍地扩增。

要准确地统计出明代或清代商人在社会职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显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四卷第十章《其他人口结构》在考述了明代设立“商籍”后有一个推测:“1630年,中国人口约为19200万,这一年的中国城市化率大约为8%,如是,城市人口大约1536万。假定商人及其家属占城市人口的40%,则全国城市商业人口大约为610万。加上乡居的商业人口,明代商人及其家属的人口总数可能达到700万。”^④限于文献的不足,这一数字还只是推测。但我们可以以徽州为例看出大致的情形。

从明代中叶开始,徽州人大量外出经商。与其他地区相比,徽州人经商

① [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69页。

② [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三,中华书局1997年,111页。

③ [明]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74页。

④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四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394页。

的和从事农耕的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明代中叶后的各种文献记载里,我们可以经常看到,徽州人从事农耕的只占到十分之三,而经商的则达到十分之七。例如,出生于徽州的明代文人汪道昆就说过“新都业贾者什七八”^①。这个比例当然只是指男性,即便如此,也是十分惊人的。从明清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徽州人外出经商,并非个体式的,而是成群结队,明末徽州文士金声就这样描述道:“夫两邑(歙、休两县)人以业贾故,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数家,且其人亦皆终岁客居于外,而家居者亦无几焉。”^②由此可见,徽州人走出家乡从事经商,是群体性的行为,他们人数众多,所谓的“徽商”其实是一个地域性的商帮。

商人阶层的扩增,与自然环境、人口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徽州经商风气的形成,就与地理环境大有关系。这个地方僻处山区,土地偏少而贫瘠,随着人口的增加,生存发生困难,所以大批徽州人外出经商谋生,民国徽人吴自法撰《徽商便览》就说道:“吾徽居万山环绕中,川谷崎岖,峰峦掩映,山多而地少。遇山川平衍处,人民即聚族而居之。以人口孳乳故,徽地所产之食料,不足供徽地所居之人口,于是经商事业以起。”^③关于人口增长的问题,何炳棣《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将洪武二十六年和嘉靖二十一年各省人口加以对比,得出了“中国的人口从14世纪后期的约6500万增加到了万历二十八年的约1.5亿”的估测^④。全国人口增长,徽州也不例外。土地有限,加上皇室和地主兼并土地,必然带来职业结构的调整,商人的比例越来越大。

明代中叶以后商人阶层不断壮大的事实,还有其他文献可以佐证。明清文人为商人撰写了为数不少的传记,例如大名鼎鼎的王世贞写有64篇,汪道昆写过76篇,大量商人的生活经历和行状都赖他们的笔墨得以保存。大量的商人传记说明,商人的确成为了一个数量巨大、影响力甚强的阶层。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一文还从人口和科举名额的角度分析读书人“弃儒

① [明]汪道昆《太函集》卷十七《阜成篇》,黄山书社2004年,372页。

② [清]金声《金忠节公文集》卷四《与歙令君书》,光绪十七年刊本。

③ 吴自法《徽商便览·缘起》,民国八年铅印本。

④ 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三联书店2000年,310页。

就贾”现象的发生原因,他引文徵明《三学上陆冢宰书》为据,得出以下数字:苏州地区 1500 名生员,三年之间只有 50 人可以成为贡生或举人,则每一生员三年之中的成功率只有三十分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读书人与其盘桓于成功率低下的科举道路上,不如“弃儒就贾”。^①

二、商人与文学家的交往

明清时期,商人与文学家交往的事实屡见于文献记载。周晖在《二续金陵琐事》中记载的一段逸事常常为人们所征引:“凤洲公同詹东图在瓦官寺中,凤洲公偶云:‘新安贾人见苏州文人,如蝇聚一羶。’东图云:‘苏州文人见新安贾人,亦如蝇聚一羶。’凤洲公笑而不语。”^②这则逸事对于商人和文人都带有讽刺,却道出了两者交往非常密切或者说互相利用的事实。

周晖所记的“新安贾人”其实就是徽州商人,他们与文学家交往的密切程度最高,这是因为徽州地区向来有着“重儒”的传统。在大量的徽商传记里可以看到,很多商人都是因家计窘迫或者科举不利而走上经商的道路。因为曾经读过书,即使他们经商之后,也仍然留心于经史诗赋,保持着文人的风调。如明代休宁商人汪贵,“自幼奇伟不群,读小学、四书,辄能领其要。于是通习经传,旁及子史百家,至于音律之妙,靡不究竟”^③。又如明代歙县商人郑作,“字宜述,号方山子。尝读书方山中,已,弃去为商。挟束书,弄扁舟,孤琴短剑,往来宋梁间。……识者谓郑生虽商也,而实非商也”^④。商人因为和钱打交道,所以形象往往带有铜臭气,可是这位叫郑作的明代徽商却大不一样。他号方山子,虽然四处经商,却“挟束书,弄扁舟,孤琴短剑,往来宋梁间”,难怪熟悉他的人都说:“郑生虽商也,而实非商也。”不仅如此,郑作在诗歌创作

① 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见《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② 〔明〕周晖《二续金陵琐事》上卷,清光绪刊本。

③ 休宁《汪氏统宗谱》卷三十七《传》,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研究资料选编》,黄山书社 1985 年,441 页。

④ 歙县《郑氏宗谱》《明故诗人郑方山先生墓图志》,《明清徽商研究资料选编》,450 页。

上还取得了一定的成就^①。因此,徽商虽然是商人,却是有文化素养的商人,这正是徽商留下的历史背影。

正因为如此,从明代中叶开始,徽商——新安贾人——和当时的文学家们就有了非常密切的交往。在一般情形下,徽商“贾而好儒”,是为了得到文士们的肯定,以获得精神上心理上的满足;同时,他们广结文士名流,也能够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经商过程中获得更有力的支持。如明代嘉靖、万历间的歙县商人方勉柔,从小读书,因为家计艰难,不得不到开封经商。当生意做得很大以后,他就“谢去游闲,专精化居,所接者皆端人正士,虽贵倨如周蕃及诸戚畹,亦且折节下交,争相引重”^②。明代休宁商人陈允德,“长嗜学古,博通群书。性孝友,然意气自豪。家世素封,善交游,海内名流恒欲得而交之,故座客常满,樽酒不空,有北海之遗风焉”^③。明代歙县商人王廷宾“商游吴、越、齐、鲁,且性颖敏,好吟咏,士人多乐与之交,而诗名日起”,有人对他的母亲说,“业不两成,汝子耽于吟咏,恐将不利于商也”。他母亲回答说:“吾家世承商贾,吾子能以诗起家,得从士游,幸矣,商之不利何足道耶!”^④这些传记资料多少都有些夸大事实的成分,好像文士们真的对徽商“如蝇聚一羶”,但也充分说明了徽商与文士们密切交往的事实。

明末清初的徽商汪汝谦可以算得上商人与文人交往的典型人物。他“号松溪道人,太学生,生于明季,慕西湖之胜,自歙县丛睦迁杭州,遂家钱塘,居缸儿巷,延纳名流,文采照映,董尚书其昌以陈大邛推之。制画舫于西湖,曰不系园,曰随喜龛,其小者曰团瓢,曰观叶,曰雨丝、风片。又建白苏阁,葺湖心、放鹤二亭及甘园、水仙、王庙,四方名流至此,必选伎徵歌,连宵达旦,即席分韵,墨汁淋漓。或缓急相投,立为排解,故有湖山主人之目”^⑤。凭着资财的富有,他在西湖建造了多个画舫,以此延揽文士,交接名流,享受湖山之胜和

① 陈田《明诗纪事》丁签卷十七录郑作诗二首,云有《方山子诗选》;复引《空同集》语:“方山子诗才敏兴速,援笔辄成。空同子每抑之曰:不精不取。乃兀坐沉思,炼句证体,亦往往入人格。”又引《静志居诗话》:“宜述诗颇俊利,远胜五岳山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389页。

② 《方氏会宗统谱》卷十九《坤斋方君传》,《明清徽商研究资料选编》,447页。

③ 休宁《陈氏宗谱》卷三,《明清徽商研究资料选编》,449页。

④ 歙县《泽富王氏宗谱》卷四,《明清徽商研究资料选编》,457页。

⑤ 《丛睦汪氏遗书》卷一所刊传记,光绪刊本。

声歌之乐。董其昌、陈继儒、王思任、茅暎、李渔、钱谦益等明末清初的文士均曾到过他的画舫和园林,并题额赋诗。除了和文人交往之外,汪然明还和当时的名媛才女有密切来往,如王薇、林天素、杨云友等,其留存的《听雪轩集》就是专收写杨云友诗作的集子。他和柳如是的关系也非同一般,柳如是到杭州后,他不仅为之安排了住处,而且对她多方关心,后来又刊刻了她的《湖上草》和《尺牋》。对此,陈寅恪《柳如是别传》^①曾作详细的考证。

商人与文学家的交往有种种情形。有的纯粹是附庸风雅,有的则是崇尚风雅,也有的商人本来就品第不俗,不宜一概而论。例如清代扬州的马曰琯、马曰璐兄弟,他们是商人,但嗜好文化,研习经史,马曰璐筑街南书屋,藏书逾十万卷。乾隆三十七年(1772),朝廷开四库馆,马曰璐儿子马振伯献书 776 种。他们自己也从事诗文创作,马曰琯著有诗集《沙河逸老小稿》六卷、词集《嶰谷词》一卷;马曰璐有《南斋词》二卷。他们又筑小玲珑山馆,成为文人雅集的场所。在这里,他们曾经举行过多种文会活动,如在乾隆八年(1743)十月,马曰琯从金陵移古梅植于馆内,厉鹗、全祖望等十多位文人都有诗吟咏唱和;乾隆十二年(1747),马曰琯邀集文友们为“重五之会”,厉鹗撰文记载道:“岁丁卯五月十五日,马君半槎招同人展重五之会于小玲珑山馆。维时梅候未除,绿阴满庭,偏悬旧人钟馗画于壁,……遂人占一画,各就画中物色,赋七言古诗一篇。”^②类似这样的活动很多,它们在参与者的诗集、文集中都有记录。《扬州画舫录》记载道:“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③除此以外,马氏兄弟还为当时的文学家们提供了不少的帮助,如著名词人和诗人厉鹗利用他们丰富的藏书辑录了《宋诗纪事》一百卷,而马氏兄弟也分别参与其中。在文友们去世后,他们都为之料理后事,并为之刊刻诗文集,据全祖望记载,姚世钰去世后,“吾友马曰琯、曰璐、张四科为之料理其身后,周恤其家,又为之收拾遗文,将开雕焉,可谓行古之道也”^④。

① 见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四章《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三联书店 2001 年。

② [清]厉鹗《樊榭山房续集集外文·分赋钟馗画引》,《四部丛刊》本。

③ [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八,中华书局 1960 年,180 页。

④ [清]全祖望《鮑埼亭集》卷二十《姚蕙田圻志铭》,《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360 页。

而全祖望本人眼疾严重,马氏兄弟邀他到扬州,为之请医疗疾。正因为如此,全祖望去世的时候,特命弟子董秉纯将其所抄文集五十卷交给马氏藏书楼。^①作为商人的马氏兄弟对文人们尊重有加,与文人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以自己的经济实力,为一批潦倒的文人提供了从事文学创作、文史研讨的物质条件和温馨的氛围,抚慰了他们的心灵,让他们保持了文化的自尊。

商人和文人之间,必然存在着互相利用的关系。从和文人的交往中,商人或者获得精神满足,或者提升社会地位,从而获取更大的商业利润;商人的银子,又是文人们获得充足笔资的来源。文人对于商人虽有利用,但在经常的交往中也逐渐加深了对商人及其社会作用的认识和理解,并给予理性的肯定。王阳明提出“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②。在他看来,职业无贵贱之分,即使是作商人,只要善于修身养性,也能够成为圣贤之人,这一认识,客观上提高了商人的地位。同时期的哲学家何心隐认为:“商贾大于农工,士大于商贾,圣贤大于士。”^③他把社会阶层重新作出划分,认为依次应该是:圣贤、士、商贾、农、工。商贾尽管依然排在士的后面,但是已经跃居农、工之前,而不是排在“四民”之末了。明代先哲李贽则给予商人以充分的同情:“且商贾亦何鄙之有?挟数万之货,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垢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④明末思想家黄宗羲也提出“工商皆本”的观点:“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⑤这些思想观念,悄然渗透到明清两代的文学创作之中,不仅使得商人生活成为重要的文学题材,许多作品对商人的描写,与以往文学的贬斥态度相比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仍然有贬斥乃至嘲笑,却增加了同情和赞美。

① 《全谢山年谱》载:“又十日,呼纯之榻前,命尽检所著述,总为一大簏,顾纯曰:好藏之。而所抄文集五十卷,命移交维扬马氏藏书楼。”《鮑塘亭集内编》附,《全祖望集汇校集注》,25页。

② [明]王阳明《传习录拾遗》第十四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171页。

③ [明]何心隐《何心隐集》卷三,中华书局1984年,53—54页。

④ [明]李贽《焚书》卷二《又与焦弱候》,中华书局1974年,138页。

⑤ [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三》,中华书局1981年,41页。

三、商人与文学题材和体裁

商人与文学家的交往所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商人题材在传统诗文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在明代中叶后的文集中,商人传记的数量之多成为一个突出的现象。有学者统计,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有墓志铭 90 篇,为商人所作的有 15 篇,占总数的 16.6%;《弇州山人续稿》中墓志铭 250 篇,为商人所作的有 44 篇,占总数的 17.6%;^①出自徽州的汪道昆有商人传记 76 篇,李维桢《大泌山房集》中商人传记同样很多。这些传记的文体大多是寿序、墓志、行状之类,大部分缺乏文学性,但它们往往表现了作者对商人的态度,记载了当时的文士和商人之间关系密切的事实,具有史料价值。

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商人传记有文学性可言,作者能够通过人物的对话、细节,写出所传商人的性格和精神,例如汪道昆的《明故处士谿阳吴长公墓志铭》:

处士生九年而孤,戴子之如适,既从程登仕受室,请受经为儒。戴泣下而执处士手命曰:“自尔之先诸大父鼎立,而父从诸父固当岳立,不幸崩析,独不得视三公。……且而父资斧不收,蚕食者不啻过半,而儒固善,缓急奚赖耶?”处士退而深惟,三越日而后反命,则曰:“儒者直孜孜为名高,名亦利也。藉令承亲之志,无庸显亲扬名,利亦名也。不顺不可以为子,尚安事儒?乃今自母主计而财择之,敢不惟命!”于是收责齐鲁,什一仅存。瞿然而思去国:“余三千里,徒以锥刀而沮将母,即巨万何为?吾乡贾者,首鱼盐,次布帛,贩缯则中贾耳,恶用远游?”乃去之吴淞江,以泉布起,时时奉母起居,捆载相及,月计者月至,岁计者岁输。戴孺人笑曰:“幸哉!孺子以贾胜儒,吾策得矣!脱或堪与果验,无忧子姓不儒。”^②

① 见陈建华《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六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学林出版社 1992 年,335 页。

② [明]汪道昆《太函集》卷五十四,黄山书社 2004 年,1142—1143 页。

汪道昆传写的是当地一个叫吴良儒的人,上引的这段文字是写其思想转变的过程。他本来是想走读书业儒的道路,而且已经拜师受业,但是,养母戴氏向他分析了家庭经济窘迫的现实,要他按照先后缓急的思路进行选择。他经过了一番思考,选择了经商;在跑了一趟齐鲁之后,他分析了经商的策略,又选择经营布业,并且以“坐贾”的方式,不影响奉母行孝。这段文字其实写了两个人物,一个是吴良儒本人,一个是他的养母戴氏。对于吴良儒,汪道昆使用了对话和独白的手法,表现了他由“儒”而“贾”的思想转变以及对商场策略的分析,从而写出了他作为商人的精明性格;对于戴氏,除了使用对话的手法外,他用“泣下而执处士手”和“笑曰”两个细节,将她的前忧后喜的神态以及对为贾的开明态度表现得十分生动。这只是一个信手拈来的例子,像这样的商人传记,为数并不少,大约是可以作为文学作品读的。

相对于文人撰写的商人传记,戏曲小说以商人及商人生活为题材的现象更为突出。正如许多研究者早已注意到的,形形色色的商贩作为文学的新主角在明代中叶以后的文学作品中粉墨登场了。长篇小说《金瓶梅》以商人西门庆作为主要人物来描写,“三言”、“两拍”等短篇小说集中,商人形象更为丰富。仅以徽商为例,据我们统计,“三言”中涉及徽商的篇目有9篇,“两拍”中涉及篇目有8篇,《杜骗新书》涉及篇目有5篇,《石点头》涉及篇目3篇。这些作品既真实地表现了商人阶层的活动和特征,也反映了文人对商人的微妙心态。在文言小说和戏曲里,描写商人的作品和笔墨也很多,对此,已有学者作过细致梳理和深入分析^①,这里就不一一论列了。

明清两代的文学,最为突出的变化是体裁的扩展。在宋代以前,文学体裁以传统的诗歌、散文为主。到了元代,作为戏曲的元杂剧勃兴。而到明代以后,不仅有了各种类型的小说,传奇戏曲也成为主要的文学体裁之一。这一重要变化,既因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支配,也与商人阶层壮大后的购买能力和阅读需要有密切关系。

相对诗歌和散文而言,作为叙事文学的戏曲和小说,必须有广泛的读者

^① 如邵毅平的《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